

赣榆区博物馆藏银铤考

张小树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博物馆现藏有七枚银铤,该银铤于1994年10月在赣榆区城西镇朱庄村一处窖藏内出土。这七枚银铤,其中四块完整,另外三块被截断或切割,均无明确纪年。银铤均弧首束腰,背部峰窝状气孔,三块完整银铤两块各重2100克,一块重2000克。银铤正面篆刻有铭文、砸有戳记、花押等符号,年代断为宋代。近日,笔者对其铭文进行了仔细研读,发现早期对其铭文解读有商榷之处。如果仅从外在形制判断,该批银铤与南宋银铤并无多大差异,但根据铭文内容对比,可以确定银铤应为金代遗物而非宋代。

- 一号铤:铭文“伍拾两三钱”“録事司买盐人王周”“行人刘成口”“验匠成济廿”“使正”。
- 二号铤:铭文“密州侯家”“诸城县”“真花铤银”“五十两三”“五十两”“验匠成谨廿”“买盐人刘诺口”“行人候琦”两处“使正”。
- 三号铤:“真花铤银”及戳记。
- 四号铤:“行人口口”“肆拾玖两肆”“使正”“行口称”。
- 五号铤:被切割,“验匠成济廿”“口玖钱半”“五十两口”。
- 六号铤:被截断,“行人王公全”“宋琦”“肆拾”“验”。
- 七号铤:被截断,“刘百伍铤”。

一号铤上的“録事司买盐人王周”铭文为同一人所刻。“録”为“录”的繁体写法,其中的“録事司”,根据《中国官制大辞典》记载:“金置于诸府与节镇所在地,掌同警巡使。设录事一人,秩正八品。”金元时期,开始出现“录事司”这一机构。“录事司”铭文的出现,可以说明该银铤为金代物品。

二号铤上的“密州侯家”“诸城县”铭文。根据宋金“绍兴和议”,两者大致以淮河一线为界,山东地区为金统治区,双方以榷场贸易的形式开展商品交换活动。密州因地理位置优越,虽远离宋金边境,仍然在密州设胶西榷场开展贸易,而诸城长期作为密州州治,因此“密州侯家”“诸城县”铭文也说明该银铤为金统治区流通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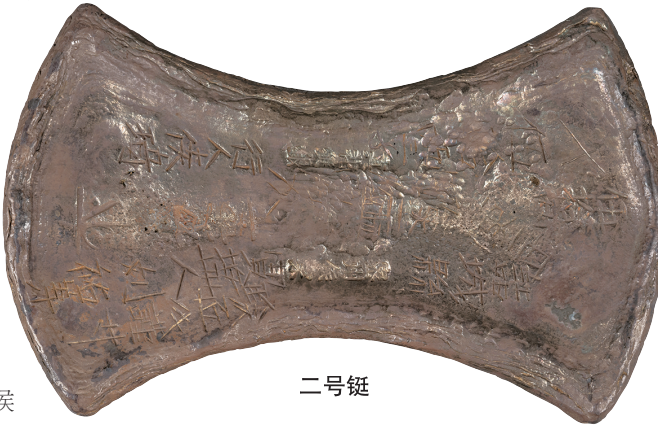
六号铤上的“宋琦”,《中国历史银铤》一书有两枚确定为金代银铤上有该人名。2016年内蒙古四子王旗发现的银铤上也有“行人宋琦”铭文。此外,《金史·食货志》载:“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值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赣榆出土的银铤中有两块是被切割的残铤,一块从束腰处截断,一块圆弧部被切割3次,这也印证了《金史·食货志》所述现象。

近年来,根据甘肃武威、内蒙古巴林左旗、安徽六安、江苏金坛等全国各地出土的宋金银铤,专家学者已经总结出金代银铤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在形制方面,均为两端圆弧,当中束腰,表面微凹、篆刻铭文并砸印戳记或画押,背面呈峰窝状;在重量方面,金代银铤多为五十两大铤,精确到“钱”,常有截断、切割现象;在铭文方面,金代银铤有使正、行人、验匠、秤子等涉及人员身份的信息。宋金并立时期,特别是宋金和议后,南宋大量岁币被送到金朝,这些岁币大都被浇铸成50两的大银铤以方便计算。实际上金统治区并无产银之地,银源都来自南宋。有些金朝纪年的银铤实际上是用南宋银铤改制而成,所以有银铤上存在敲砸痕迹,通过砸敲把原有铭文毁掉重新刻制铭文。赣榆出土的一号、二号、七号铤均有明显的敲砸痕迹,尽管没有明确纪年,但局部可见残留旧有刻划痕迹。这也是部分金代银铤被误作南宋银铤的重要原因。

赣榆地区之所以出土银铤与该地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赣榆东临大海,是盛产食盐之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食盐的输出地之一。《金史·食货志》记载有“国家经费,惟赖盐课”。金人控制赣榆地区后,赣榆被纳入山东盐场管辖范围。为获取丰厚的税收,金人承袭汉人旧制实行食盐专卖。赣榆出土的银铤上出现买盐人姓名,可推测该批银铤是用来支付买盐的货款,货款近300两白银,因突发意外未及转运而仓促间埋于地下。综合各种因素,我们可以确定赣榆出土的这批银铤应为金后期遗物。



一号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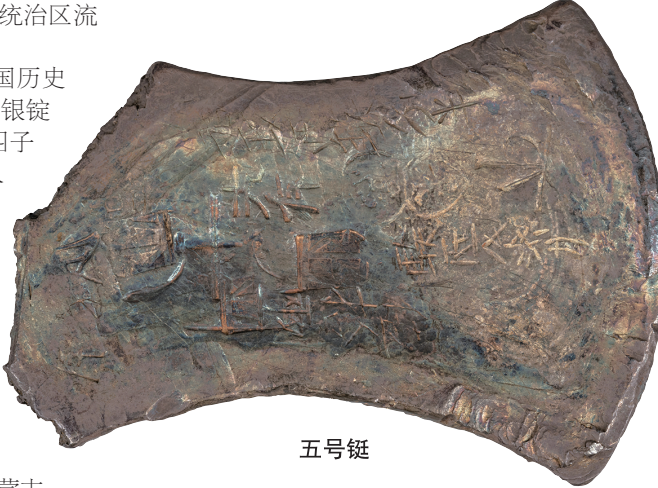
二号铤



三号铤



四号铤



五号铤



六号铤



七号铤

浅谈东汉洪州窑青瓷制作成型技艺

付太慧 余安安

经过史前时期的发展,剑邑(江西丰城别称)先民通过对制瓷原料的不断认识和窑炉烧造技术的不断改进,洪州窑于2000年前左右的东汉中期成功破译了制造青瓷的密码,并在长期制瓷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规范、完整的洪州窑系手工制瓷工艺。

青釉瓷是中国最早烧造的瓷器品种之一。青瓷色调的形成,主要是胎釉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在还原焰气氛中焙烧出的瓷器呈青绿色,故名青瓷。但有些青瓷因含铁不纯,还原气氛不充足,色调便呈现泛黄或泛褐色。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被称为“瓷器之花”。青瓷的形体骨感美凝聚着窑匠高超的制坯成型技艺。据2004年港塘陈家山洪州窑遗址考古发现,大量器物书写有谢仲良、余产等铭文文字款,这些字款,有的是窑工或作坊主姓氏,有的说是坯工姓名以方便计数之用,有的说是官窑锥形标识,众说纷纭。无论是何用途,都反映了洪州窑以流水线作业和规模化生产提高劳动效率的事实,即匠师们都掌握了属于自己的专门技术,单独一个工匠只履行生产过程的一步,一组工匠只完成产品中的一个部分,所有工匠通力合作才能最终完成产品的制坯成型。从出土标本看,东汉中期主要器形大多仿青铜器而作,大型器物如鼎、甑、甗、罐、缸等采用泥条盘筑,对碗、盆、盘等器物采用拉坯成型法。流行麻布纹、水波纹、锥刺纹和铺首等。推断其制作成型工序为: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制造敞口筒状支烧器等窑具(现为匣钵)——泥条盘筑和拉坯成形(打磨修整)——晾坯补水——坯胎成型。

- 1.采石制泥。把制瓷固体原料进行粉碎、净化、均化、掺和、化浆、搅拌、除杂(除铁),制成可塑性软泥团,为下道工序提供合格的泥料。在这道工序里,窑工们把固体瓷石倒入大容器、待粉碎后再铲出石粉,将其倒入淘洗池、沉淀池、稠化床,并在稠化床中踩练泥料。
- 2.淘炼泥土。这道工序是因为稠化床中踩练泥料可能还不够精细,而且在运输制作过程中可能还会混入其他杂质,所以泥料必须

经过再淘洗才可使用。淘洗使用三个缸或其他容器,中间一只称为淘洗缸,左右各放一只容量较大的陶缸或木桶称为沉淀缸或沉淀桶,将泥料投入淘洗缸,加水浸泡数小时后用木棍搅拌,但不要将泥层全部翻起,见有部分泥粒悬浮即可。待上层悬浮泥水稍澄清,即将表面的一层含有细颗粒的泥水,用曲木柄横贯两耳的硬舀舀入沉淀缸中。经过一定时间,等到细粒泥质完全沉淀后,再将上层的清水舀回淘洗缸,重新将泥料搅起,进行第二次淘洗。按以上方法反复淘洗几次,直到淘洗缸中下沉的粗粒部分已无细颗粒为止。沉淀缸中淘好的精泥经过一天左右的沉淀后,即可将上面的清水弃去,使泥浆浓缩。接下来,待坯泥干至可供成形时,将坯泥聚集放在泥房的洁净石质地板上陈腐,七天后用铁铲移到另一处并有规则的踩练一次,每踩完一层,又用铁铲增加一层,逐渐成堆,依此法踩练数次后,再用泥铲打成泥,即将已踩过的泥料用泥铲铲到另一处堆堆拍打,使泥料最大限度排除气孔,提高成形性能。传统打泥有“三道脚板两道铲,莲花墩,菊花心”之称,这是打泥操作的要求和经验总结。泥料在泥房内陈腐和踩打的过程,就是泥料均化和致密化的过程。经过陈腐和踩打的泥料,在制坯前,还要经过揉泥这个最后环节。所谓揉泥就是用手进行揉揉、拍打、挤压、捧拉等操作,对泥料施加外力,以充分排除泥料中的空气,同时进一步使泥料中分布均匀。这一手工揉泥现演变为用真空练泥机和捏泥机取替。实践证明,有经验的陶工揉泥后的泥料致密度比真空练泥机挤出来的泥料还好。揉泥的操作方法是坐在一条长板凳(称码头)上进行,凳面上垫一块白布,操作人员骑坐在凳上,对泥团进行揉搓拍打,拉伸压缩、锯开合拢。

3.炼灰配釉。“无灰不成其釉”,灰是配制釉的主要成分,釉灰是用石灰原料和植物草茎烧炼,用水淘洗而成的。釉浆是用风化较快的瓷石如同“采石制泥”般地经过粉碎、淘洗、浓缩稠化、水溶解后制成的“细泥浆”,现称“白不”。釉是用釉灰和细泥按配方比例调配而成。用釉灰

做助熔剂配釉是洪州窑窑匠集传统陶瓷制作工艺之大成的重要体现。

- 4.制造敞口筒状支烧器等窑具(现为制造匣钵)。即选用土质原料预烧支烧器等窑具,以备装成型坯胎入窑烧制之用。
- 5.泥条盘筑。通常采用分段盘筑制成,在衔接面之间的胎壁较厚,以便于上段和下段衔接,然后抹余。在壶的颈、肩部及甑、甗、罐的口、肩接合处的内壁都可以看到盘筑衔接的痕迹。为了衔接处更紧密,窑匠用手顶住器内壁,用陶拍上下多次拍打外壁,排除衔接处的空气,以增加器壁的抗压强度,器内壁布满一个个指纹留下的凹窝。最后再对器外壁打磨修整、补水,器表显得平整光滑。
- 6.拉坯成形。将准备好的坯料投放在旋转着的陶车(也称辘轳车)上,在外力的作用下,变成适应人们生活需要的器形,其操作过程称为拉坯成形。它既是一种物理过程,同时也包含着造型设计、审美、人机工程学等内容。
- 7.晾坯补水。拉坯成形或其他方法成形的初坯因极易损坏,所以在保持坯体不开裂变形的情况下,要采取措施加快干燥速度,以提高生产效率。阴干安全可靠,干燥速度慢,而晒干干燥速度快但容易出现干燥缺陷。这就要凭生产经验,予以灵活掌握。坯体经打磨修整和干燥之后,均需逐个补水。因为手工拉坯产品经打磨修整坯面常有细孔和细小痕迹,并附着坯粉和灰尘,如果直接施釉,烧制过程极易导致麻点、针孔、缩釉等釉面缺陷。补水一方面可使坯面更加平整,消除痕迹,除去吸附在坯面上的坯屑、粉尘等杂物,减少产生釉面缺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补水发现坯体中隐藏的气孔和“死泥”(揉泥时未清除的混在湿泥料中的硬泥团),提高成品率。一般在补水前先清扫、吹净坯体内外的灰尘杂质等,再用特制的补水工具蘸清水刷抹。补水时应注意保持用水清洁,经常换水,防止水中沾有油渍或污物、杂质,否则容易产生缩釉等缺陷。

一件瓷器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今天,让我们重温洪州窑东汉青瓷制造的纯熟手工技术,更显古人智慧和创造性。

浅析北凉缘禾五年民杜犊辞文书

肉克亚古丽·马合木提

由杜犊负责管理征收。但是宋相明所养之马,却一向由他自己骑乘。这样有时会与官府用马的不时之需发生冲突。北凉缘禾四年(435年)十月,两人为此还私下讨论协商,决定宋相明的状况还是要如实上报,也要承担责任。宋相明自己用马之时,要向杜犊汇报,并经杜犊同意后才用这四匹马。由于文书残缺,我们无法准确了解杜犊提交这份申请的准确意思。但推测可能是宋相明出了什么变故,无法按官府计划交出马匹。而杜犊向官府说明事情原委,就是为了划分清楚各自权利和责任,从而使自己不为宋相明的变故承担责任。

文书中所体现的按赏配马的政策有着当时特有的地方特色和时代背景。首先,“缘禾”这一年号,即为北凉沮渠牧犍政权奉北魏正朔所起的年号,“缘禾”即北魏太武帝所用的第三个年号“延和”。后来沮渠牧犍还是被北魏所灭,其继任者沮渠无讳退据敦煌,还一度降魏。而当时阉竖乘势而起,自称高昌太守,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从文书中的“去前十月内胡贼去后”一语,可推断出北凉势力退出高昌的具体时间。公元433年沮渠蒙逊卒,牧犍即位,国势衰败,公元439年降于北魏。文书告诉我们,其力量被迫收缩撤出高昌应在公元435年10月。此处“胡贼”所指可能是北凉沮渠氏。北魏在灭北凉前就和西域发生了联系,公元435年,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车师等九国曾遣使向北凉贡献,由于受到北凉的阻隔,往来并不畅通。

公元327年,前凉政权在吐鲁番设高昌郡。高昌郡成立以后,经历了五个凉权(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一百多年的轮流统治,高昌郡的政治体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在对高昌地区行政管理上,已形成一套有效的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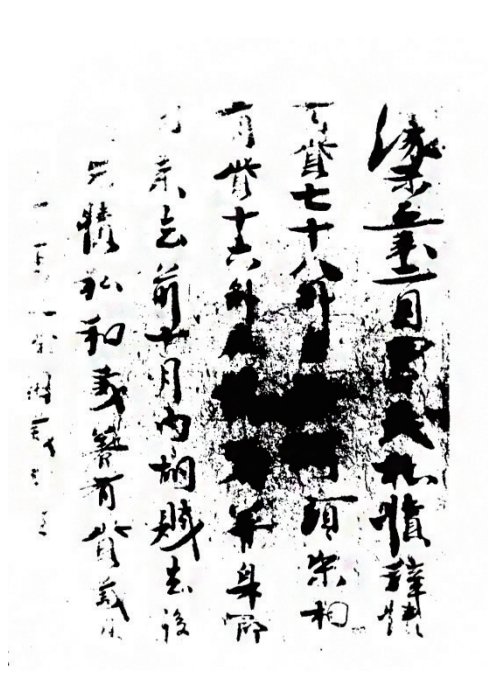
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知道北凉时期施行按财产的多少分配养马以备征用的制度。北凉计赏之后,按照此配养马匹,至于是否还按赏征收什么,以及配养马匹数与赏额的关系等问题目前还没有准确答案。在高昌地区,根据吐鲁番出土高昌王朝文书,可以看到直至麹朝,在一定程度上承袭着按赏配养马制度这一地方特色。

古代吐鲁番地处西域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自西汉设置戊己校尉以来,和凉

州地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前凉以后,经历后凉、前秦、西凉、北凉,一直是凉州的属郡。当时吐鲁番的居民包括少量车师人(当时尚有车师前部王,车师人大都居于交河城周围)、汉兵的后代和大量来自西域和内地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其中从凉州进入的最多。因此当时的吐鲁番的军事制度受到前凉的影响。

在那样一个战乱不休的年代和地区,壮大自身的军事实力乃当权者的首要任务。按赏配马的政策应运而生,而所征调来的马匹也大多充作军用。老百姓如果不能按时按量完成任务,则会被发往城塞戍守。杜犊当时可能为撇清自己责任写下这份报告。

《缘禾五年民杜犊辞》这件文书保存完整,书写流畅,文字清晰,为吐鲁番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材料,是研究吐鲁番历史、新疆历史、北凉政权等的珍贵资料,并对高昌地区政治史、军事史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是各民族融合和发展的重要物证。



《缘禾五年杜犊辞》文书

(上接5版)
此外,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任志录《北朝晚期釉陶的青瓷化》,认为北朝晚期的白胎釉陶和装饰的目的,不是为了仿制南方青瓷,而是为了抵制南方青瓷并且取而代之,这使得北朝釉陶一方面不自觉地吸收了南方汉文化的青瓷,另一方面又对青瓷进行了大量的改造和装饰,创造出独特的青瓷化釉陶,最终促成了北方陶瓷的发展,这是鲜单化和汉文化融合的结果。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郑建明《浙江青瓷上早期加彩装饰及其起源初探》,认为中国瓷器上最早的加彩装饰出现在西周早

期的原始瓷上,早期加彩瓷器起源的地点以浙闽赣交界和太湖南岸为核心区,以吴城和闽南粤东为次级区,并对瓷器加彩装饰起源的社会动力机制进行了探究。

会议间隙,与会嘉宾讨论热烈,学术氛围浓厚。尤其对邛窑三彩是陶是瓷的属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认为邛窑三彩器不能仅仅根据其烧成温度高这一方面就将其归属为瓷器范畴,从其属性来看还应归属于釉陶。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刘毅认为,邛窑产品从胎体上看是一脉相承,但从其釉的

使用看,古代匠人肯定是有所区别。中国考古学会陶瓷考古专委会主任秦大树则提出对低温釉器的概念如何定义的问题。

综上,本次会议以“邛窑”为核心,围绕邛窑相关问题、唐宋时期南北制瓷技术交流以及瓷业考古等领域展开深入研讨。会议揭示了邛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拓展了陶瓷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同时,我们也意识到,陶瓷研究需要吸引更多年轻学者参与,以充实学术后备力量,保持研究的持续活力与创新性,为古陶瓷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动力。